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
文獻整理與研究 (上)

孫繼民 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K206.3
20121

阅 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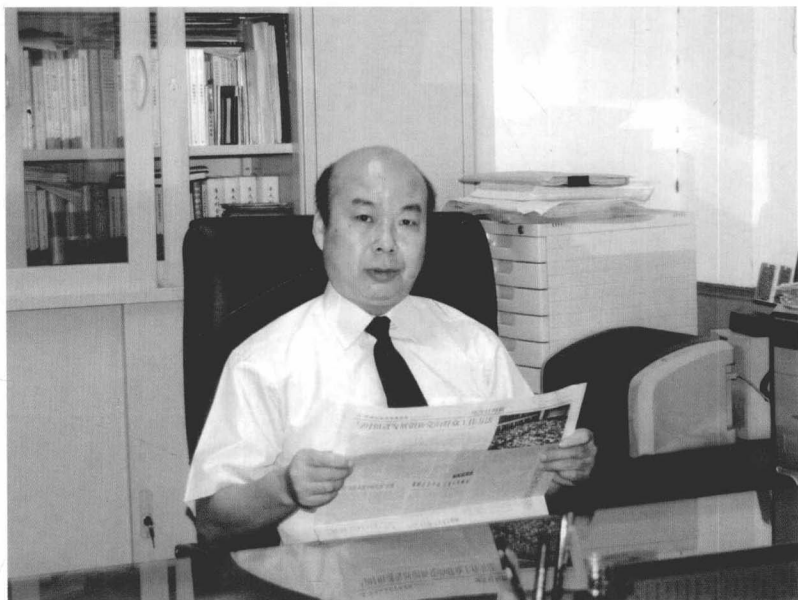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 文献整理与研究（上）

孫繼民 宋 坤 陳瑞青 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簡介

孫繼民 男，1955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鄲市，1985年武漢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1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副院長，河北師範大學兼職教授，邯鄲學院特聘教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社會兼職有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河北省史學會會長，2008年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稱號。專業研究內容主要為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以及戰國趙文化、河北地方史。先後主持、承擔六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專著有《唐代行軍制度研究》、《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河北新發現石刻題記與隋唐史研究》、《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等。目前正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與研究》。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出版說明

爲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的示範帶動作用，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決定自2010年始，設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每年評審一次。入選成果經過了同行專家嚴格評審，代表當前相關領域學術研究的前沿水平，體現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學術創造力，按照“統一標識、統一封面、統一版式、統一標準”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2011年3月

前 言

黑水城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東南約 25 公里的荒漠中，歷史上發源於祁連山的黑水(古稱弱水)曾流經這裏，使這裏成為一片宜於耕種的綠洲。西夏立國後，在此設置黑水監軍司，作為北方的軍事重鎮。西夏寶義元年(1226)蒙古大軍攻破黑水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設亦集乃路總管府，歸甘肅行省管轄。“亦集乃”為西夏語稱，意為“黑水”，“亦集”即“水”意，“乃”即“黑”意。元朝沿用西夏舊稱，仍名“亦集乃”，後世異稱為“額濟納”。元亡以後，黑水改道西移，草場農田淪為沙丘，城郭隨之廢棄。

黑水城廢棄五百多年後，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P. K. KOZLOV)於 1908 年至 1909 年，兩次到黑水城遺址中進行挖掘，發現了大批歷史文物並運往俄羅斯。這批文物分為文物和文獻兩類，文物部分收藏在俄羅斯國立愛米塔什博物館，文獻部分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俄藏黑水城文獻資料據統計共有 8000 多個編號，其中大部分為西夏文，約占 90%，其餘為漢文、回鶻文、藏文、波斯文文獻。文書的年代，據《俄藏黑水城文獻·年表》有確切紀年的上至唐建中二年(781)，下至北元宣光二年(1372)，時間跨越近六百年。^① 文書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語言、宗教等各個方面，是研究中國古代唐至元代特別是西夏、

^①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藏有一件清代文獻，即俄藏編號 TK319 號文書，《俄藏黑水城文獻》編者將其訂為宋刻本，但據劉廣瑞研究，其應為《道光元年時憲書》刻本殘頁。參見劉廣瑞《俄藏黑水城文獻〈官員加級錄〉年代再證》，《宋史研究論叢》第 10 輯，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宋、金(包括偽齊政權)時期歷史的原始資料,價值極大。

黑水城文獻入藏於俄國以後,除了俄國和前蘇聯學者對漢文文獻進行過一些系統整理研究,出版有《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等書和部分論文之外,^①中國學者罕有目睹。20世紀90年代,在中俄兩國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這些文獻終於結集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以下簡稱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目前已出版至第14冊,計劃全部出齊共計30冊。《俄藏黑水城文獻》由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和西夏文佛教部分三部分構成。漢文部分共6冊,而這6冊漢文文獻當中的所有非佛教文獻就是本書整理和研究的對象。

國外對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研究比較早。1911年,伊鳳閣在《皇家科學院通報》第11期發表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這批漢文文獻。1910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訪問聖彼得堡,閱覽了黑城文書,1914年他發表《科茲洛夫考察隊黑城所獲漢文文獻考》一文(《亞細亞雜誌》1914年5—6月號),對科茲洛夫所獲的23件黑城漢文文獻作了介紹和研究。1934—1936年,弗魯格發表《關於西夏刻印的漢文經文》(《東方書目》第2至4輯,1934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寫本非佛經部分概述》(《東方書目》第7輯,1935年)、1936年發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寫本佛經簡明目錄》(《東方書目》第8至9輯,1936年)。系統整理、介紹和研究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的是前蘇聯的孟列夫,他充分利用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館藏資料,整理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1961年發表《黑水城出土的早期出版物(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科茲洛夫收集品漢文部分)》(《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57期),1984年出版《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蘇聯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20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國外的西夏學研究逐漸走入

^①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也於1914年發表《科茲洛夫考察隊黑城所獲漢文文獻考》,《亞細亞雜誌》1914年5—6月號。

低潮。但日本學術界對西夏研究及黑水城文獻的興趣卻方興未艾，湧現了一大批相關論著，其中關於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的主要有：松沢博《西夏穀物貸借文書研究餘滴(2)：〈俄藏黑水城文獻〉所收仏典紙背文書について》（《竜谷史壇》第112號，1999年3月）、《西夏穀物貸借文書研究餘滴(3)：〈俄藏黑水城文獻〉所收仏典紙背文書について》（《東洋史苑》第55號，2000年3月）；近藤一成《〈俄藏黑水城文獻〉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裁判案件記注稿》（早稻田大學東洋史懇話會編：《史滴》第25號，2003年12月；第26號，2004年12月；第27號，2005年12月）；西田龍雄《黒水城出土西夏文獻について》〔《日本學士院紀要》第60(1)號，2005年10月〕；竺沙雅章《黒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號，2003年6月）；椎名宏雄《黒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の出現》（《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第62號，2004年3月）；佐藤貴保則主要對俄藏黑水城所出西夏漢文榷場使文書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相關論文《ロシア蔵カラホト出土西夏文〈大方広仏華嚴經〉經帙文書の研究——西夏榷場使関連漢文文書群を中心に》（《東トルキスタン文書〈胡漢文書〉の総合調査》，2006年）。

黑水城文獻出土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但是由於一方面學術界對黑水城文獻研究的興奮點在西夏文文獻上，另一方面沒有公佈黑水城漢文文獻影印件，因此早期學術界對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相對比較薄弱。國內學者較早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是陳高華、陳國燦、李偉國等先生。1977年陳高華發表《亦集乃路河渠司文書和元代蒙古族的階級分化》（《文物》1977年第5期），這是對黑水城文獻較早的研究成果。1980年陳國燦發表《西夏天慶典當殘契復原》（《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運用文獻學方法，復原了斯坦因所獲的西夏天慶典當殘契，而《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冊和第2冊當中也有“西夏天慶典當殘契”，可以結合起來進一步研究。李偉國在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中發表的《紹興末隆興初舒州酒務公文研究(之一)》一文中提到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一批宋代鄜延路軍隊的文書（即編號為ИНВ. No. 211 213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指出這批文書迄今尚未公佈。此外還有張培瑜、盧央《黑城出土殘曆的年代和有關問題》等論文（《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這一時期國內學術界對俄藏黑水城漢

文非佛教文獻取得的較大研究成果是關於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的校勘。主要成果有：廖珣英《劉知遠諸宮調校注》（中華書局 1993 年版）、藍立冀《劉知遠諸宮調校注》（巴蜀書社 1989 年版）、張星逸《關於金刻〈劉知遠諸宮調〉的校注》（《江海學刊》1964 年第 1 期）、張星逸《補關於金刻〈劉知遠諸宮調〉的校注》（《中國語文》1965 年第 5 期）等。

1996 年以後，由於《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至 2000 年版）陸續出版，首次公佈了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全部圖版，使國內學者得見皮藏異域的黑水城漢文文書圖版和該書後附的《敘錄》對已出 6 冊漢文文書進行的提要式介紹以及相當部分的文字釋錄，為學者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學界掀起了一個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的小熱潮。自此而後發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柴劍虹《俄藏黑城出土釋道詩詞寫本簡析》（見柳存仁等編《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天津出版社 1996 年版）；蔡榮婷《俄藏黑水城牧牛詩初探》（《敦煌文學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馬繼興《日、英、俄藏三種〈孫真人千金方〉珍稀文獻及其重要意義》（《敦煌吐魯番研究》1997 年第 2 期）、《俄國現藏的中國出土古醫藥文獻》（《中華醫史雜誌》1999 年第 1 期）；白濱《〈俄藏黑水城〉漢文部分述要》（《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張如青《俄藏黑水城中藥文獻初探》（《中華醫藥史雜誌》1999 年第 1 期）、《俄藏黑水城文獻〈辰龍麝保命丹〉考釋》（《中醫文獻雜誌》2004 年第 2 期）；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漢文曆書考》（《文物》2001 年第 10 期）；趙彥龍《西夏時期的契約檔案》（《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王銘《元代亦集乃路河渠司上總管府具保結呈考辨》（《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2 年第 2 期）；李輝、馮國棟《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 年第 2 期）；馬彩霞《關於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經濟文書的考釋》（《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陳志英《〈元皇慶元年（公元 1312 年）十二月亦集乃路刑房文書〉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2004 年第 5 期）；石昆《從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看元代亦集乃路的西夏遺民》（《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2 期）；馬格俠《俄藏黑城出土寫本〈景德傳燈錄〉年代考》（《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2 期）；惠宏《俄藏黑水城漢文醫藥文獻概

要》(《國藥論壇》2005年第1期);段玉泉《俄藏黑水城文獻〈初學記〉殘片補考》(《寧夏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黑水城文獻〈資治通鑒綱目〉殘頁考辨》(《寧夏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楊浣《黑城〈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考釋》(《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1期);張廷傑《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寧夏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孫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韻抄本〈解釋歌義〉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湯君《黑城文獻〈莊子義〉考》(《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2期)、《呂惠卿〈莊子義〉集校》(中華書局2009年版)、《西夏全真教佚詞十一首考釋》(《宗教學研究》2007年第2期);陳靜《黑水城〈呂觀文進莊子義〉研究》(“道家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08年6月);沈衛榮《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西域佛教史——基於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書的探討》(《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連劭名《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研究》(《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杜建錄《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書考釋》(《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黑城出土的幾件漢文西夏文書考釋》(《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4期)、《黑城出土西夏榷場文書考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陳瑞青《從俄藏黑水城文獻看宋代公文的貼黃制度》(《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2期)、《關於一件宋代軍政文獻的考釋》(《文物春秋》2007年第4期)、《黑水城所出宋代統制司相關文書考釋》(《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3期)、《從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獻看北宋收復燕山府之役》(《宋史研究論叢》第7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崔為、王姝琛《黑城出土的〈傷寒論〉抄頁》(《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鄧文寬《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1210)具注日曆〉殘片考》(《文物》2007年第8期)、《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歲(1211)具注曆日〉三斷片考》(《敦煌吐魯番天文曆法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張國旺《俄藏黑水城TK194號文書〈至正年間提控案牘與開除本官員狀〉的定名與價值》(《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許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軍政文書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彭向前《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再探》(《寧夏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黑水城出土漢文寫本〈六十四卦圖歌〉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第2期);韋兵《俄藏黑水城

文獻 A32〈佛說壽生經〉錄文：兼論 11—14 世紀的壽生會與壽生寄庫信仰》（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 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佛教世俗化與宋代職業倫理建構——以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為中心》（《學術月刊》2008 年第 9 期）；杜立暉《俄藏黑水城肅州路官員名錄文書考釋》（《西夏學》第 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陳豔《俄藏黑水城 TK318 號文書題名及版本問題》（《西夏學》第 4 輯，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劉廣瑞《俄藏黑水城文獻〈官員加級錄〉年代再證》（《宋史研究論叢》第 10 輯，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朱建路《黑城所出〈至正廿四年司吏劉融買肉麵等物呈文〉考釋》（《元史論叢》第 11 輯，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筆者從 2002 年開始將研究關注重點逐漸轉移到黑水城漢文文獻之上，先後獨立或合作發表《黑水城所出宋趙德誠家狀試釋》（《敦煌學輯刊》2002 年第 2 期）、《關於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軍事文書的考釋》（《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蔭補擬官程式》（《歷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俄藏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王庶被拘事件》（《宋史研究論叢》第 7 輯，河北大學出版 2006 年版）、《試釋幾件俄藏黑水城宋鄜延公文草稿》（《西夏學》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俄藏黑水城文獻宋代小胡族文書試釋》（《中華文史論叢》2007 年第 2 期）、《火器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新刊偽齊阜昌三年（1132）文書解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0 卷，2007 年）、《俄藏黑水城金代毛克文書初探》（《歷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俄藏黑水城所出一件金代軍事文書再探》（《中國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西夏天盛十五年（1163）王受貸錢契等〉考釋》（《宋史研究論叢》第 9 輯，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敦煌學視野下的黑水城文獻研究》（《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俄藏黑水城西夏漢文數量構成及經濟類文獻價值》（《民族研究》2010 年第 3 期）等文章，出版專著《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中華書局 2009 年版），並從黑水城文獻的年代構成及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內涵及外延等方面論證提出了“黑城學”的概念（孫繼民：《黑城學：一個更貼切的學科命名》，《河北學刊》2007 年第 4 期）。

二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時間跨度較大，包括唐、五代、宋、西夏、偽齊、金、元(含北元)，其中元代的數量最多，其次是西夏、宋。這批文書的價值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點是提供了許多史籍所不見的新資料，正如孟列夫《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導言》漢文版所指出的：“大大填補了迄今已知的歷史資料，並使其更為詳盡。”孟列夫所說的“填補了迄今已知的歷史資料”，實際說的就是這批文書的補史價值。筆者以為，這些補史價值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說明：

第一，補充了宋夏金元時期經濟活動的許多具體和細節材料。例如，第6冊《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當中收有一組裁判案文書，其中保留了比較完整的案件審理程式，是研究宋代司法史的重要材料。不僅如此，由於案件涉及倉司官員貪污問題，因此在當事人和證人的申狀中涉及很多社會經濟內容。比如，對於交旁、關子、會子等票據有着十分詳細的記載，而史籍中對於交旁、關子和會子的性質以及功用語焉不詳。通過這批文書，我們可以發現“交旁”是宋代軍隊專門用來支取糧食的憑證，“寄倉會子”是北宋末期陝西軍隊寄倉所使用的一種信用票據，“白會子”是北宋末期陝西軍隊內使用的一種不完備的信用票據。這都補充了史籍記載的不足。又如，西夏《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糜麥契》、《西夏天盛十五年貸錢契》等文書所反映的民間借貸方式、書式、種類、計息等內容，補充了史籍當中關於高利貸放貸形式的某些規定。如《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規定：“全國中諸人放官私錢、糧食本者，一緡收利五錢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願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而通過第6冊《西夏天盛十五年貸錢契》，可知一緡收利五錢為日息，一斛收利一斛為年息。第6冊《榷場使文書》更是對西夏邊境貿易、進出口貿易制度、榷場使管理制度和文書制度等內容有着直接反映，且通過此組文書對於川絹價數及所收稅河北絹數的記載，我們可以推算得出西夏大慶年間的稅率及西夏度量衡當中匹與尺之間的換算關係，此均為史籍所未載。再如通過第6冊《至正廿四年司吏劉融買肉麵等物呈文》，我們可以看到元代後期亦集乃路地區小麥已經具有一般等價物功能，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得知元末亦集乃路的紙鈔已經信用敗壞而退出

流通領域，小麥因為珍貴而成為商品交換的中間媒介，代替了紙鈔的作用，此亦非可據史籍記載而得知。

第二，補充了宋夏金元時期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新材料。例如，第6冊《西夏天盛十五年貸錢契》中有“立文字人”某某於“齊趙國□(王)處取到課錢壹”等內容。筆者曾對其中的“齊趙國□(王)”發生興趣，經過研究之後認為這裏的“齊趙國□(王)”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第3冊所收TK124號《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末西夏天盛十九年施經發願文尾題最後一句話“天盛十九年五月日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謹願”中的“秦晉國王”類似，都屬於雙國爵封的封號。並由此推測：“在‘多與宋同’的西夏官制結構中，也有一部分與宋不同的官制成分，這些與宋不同的官制成分就至少包括了封爵制度；西夏官制在主要摹仿宋制的同時也兼采部分遼、金特別是遼代制度。”可見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提供了研究西夏爵封制度的新材料。又如，通過對俄藏、英藏及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當中幾件河渠司文書的共同解讀，我們可以發現元代亦集乃路河渠司職能寬泛，在其他地區通常由州縣地方政府負責的事情，像呈報收成分數、拘收子女及催徵稅糧等，在亦集乃路卻由河渠司承擔。河渠司承擔了許多本應由州縣負責的常規性事務，可以說河渠司起到了一級行政機構的作用，而河渠司的此種職能，正好填補了亦集乃路總管府與基層村社之間缺乏州縣級行政建置的空缺。黑水城漢文文書提供了研究元代地方行政運轉機制的新材料。

第三，補充了宋夏金元時期軍事制度方面的一些新材料。例如，第6冊《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中有多件“策應環慶路軍馬”下發的文書。從文書內容看，“策應環慶路軍馬”是靖康元年(1126)西夏進攻環慶路宋軍時由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組織的。文書第92頁是一件“統制司”下發的文書，文書表明這個統制司由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下統諸將組成，實際上應該就是“策應環慶路軍馬”的異稱。這裏的“統制司”和“策應環慶路軍馬”均不見於史籍。另外，這組文書中還有四頁有關“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字樣的文書，而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這一機構名在史籍中非常罕見，只見於宋人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十九《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孫公昭遠行狀》，稱靖康元年(1126)“永興路安撫使范致虛自稱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號召諸路之師”。文書不僅證實了范致虛所設機構的正式名稱為“御前

會合軍馬入援所”，而且記錄了該機構指令的許多具體內容，反映了這一機構運轉的實態，非常寶貴。再如猛安謀克是女真人的部落軍事制度，金朝建立後，打破了原來的血緣關係，將漢人也編了進來。《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一記載：“猛安謀克，以管女真戶為上，雜以漢人為下。”第6冊的兩件金代軍事文書《毛克文書》和《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可以使我們對金朝的軍事制度有進一步的了解。《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原記載的軍種有馬軍、步軍，另有區別於官軍的自願軍、弓箭手。其中之自願軍為史籍之所未載，而弓箭手是宋朝在沿邊推行的一種民兵制度，有番、漢之分。從《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可知，女真族在入主中原後，將此種兵制繼承了下來。

第四，補充了宋夏金元時期文書制度的許多重要資料。例如，史籍有關宋代文書制度的記載非常豐富，但傳世的實物文書卻很有限，第6冊《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可貴之處就是它作為第一手資料的實物文獻而保留了宋代公文的大量原始信息，為我們研究宋代公文制度提供了可靠的資料。楊倩描《俄藏黑水城宋代軍政文書與宋史研究——以廊延路為中心》就認為與唐史研究相比文書制度是宋史研究一個薄弱環節，“這些文書最具價值的部分是它提供的文書形式”^①。有關《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對宋代文書制度研究的價值，孟列夫、白濱等先生的文章都有涉及，陳瑞青同志的碩士學位論文《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獻所見文書制度初探》有更全面深入的研究，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又如第6冊《榷場使文書》保留了大量西夏榷場使文書的原始信息，據其我們可以復原榷場使文書書式，進而瞭解西夏的榷場使文書格式。再如通過將俄藏黑水城文獻與英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當中的元代帶千字文編號文書歸類，我們可以發現元代帶編號文書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編號在文書中，這類文書反映了公文運轉流程及放支錢糧等問題；一類是編號在文書外，這類文書放映了架閣庫收藏形式，補充了元代公文管理制度的某些具體內容。

第五，補充了宋夏金元時期某些古籍版本流傳的新材料。《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6冊當中收有多件古籍刻本，具體有：第1冊宋刻本《平水韻》、宋蜀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宋刻本《廣韻》；第2冊宋刻本郭象

^① 參見《河北學刊》2007年第4期。

注《南華真經》；第3冊宋金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經》；第4冊金刻本《孫真人千金方》、金刻本《六壬課秘訣》、金刻本《辰龍麝保命丹》、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宋刻本《新唐書》、宋刻本《策論》；第5冊元刻本《韻格簿》、宋刻本《初學記》、宋刻本《漢書》、元刻本《資治通鑒綱目》、宋刻本《孝經注》、清刻本《大清道光元年時憲書》；第6冊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等，另有多件西夏刻印《具注日曆》殘片。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中所存古籍刻本數量雖然不多，但其中不乏珍本，例如第1冊宋刻本《廣韻》，余迺永先生即曾通過將此件文書與日本真福寺寶生院大須文庫的宋刊《廣韻》進行對比，指出此俄藏《廣韻》最有可能的出版年代，當在徽宗至欽宗之世(1101—1126)，被後來南宋高宗紹興間(1131—1162)刊行的監本所據，為監本之祖本。又如第1冊宋蜀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刊于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7)或以後，早已散佚，目前現存金刻本，可以以之對其進行校勘。再如第4冊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存第5至第9卷，該書為南北朝到唐五代、北宋初期趣聞軼事彙編，刊行時間大約在公元1085年至1180年的90年間，中原內地早已散佚，此為孤本。此外，《孫真人千金方》、《新唐書》、《漢書》、《劉知遠諸宮調》等殘葉也都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

當然，以上有關《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非佛教文獻資料價值的闡述只是掛一漏萬，相信以後隨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其資料價值將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

三

目前有關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系統整理的著作是孟列夫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和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編纂的《俄藏黑水城文獻》。

《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一書是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進行系統整理和介紹的第一部專著，由前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編輯部於1984年出版。此後，該書由王克孝先生翻譯為中文(其中有節略)，1994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為《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據王克孝譯本，《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分“漢文版序言”、“導言”、“黑城漢文遺書敘錄”、

“附錄”和“譯者後記”五大部分，其中的“黑城漢文遺書敘錄”又分為“佛教經典作品”，“漢文佛教原著”，“儒家和道教的作品”，“歷史著作和文學作品”，“字書”，“木版畫、裝飾圖案、彩色畫、素描、印章”，“醫書、曆書、占卜書”，“紙幣”和“文書”9個部分。對這批漢文文書整理的內容主要是介紹文書的俄藏編號、紙質、現存狀況(頁數、行數、字體等)、文書內容、文字起止，文書出現的人名地名、年號時間、軍隊番號、印章押署等，並有若干字句的錄文。孟列夫的上述整理是這批漢文文獻首次面向學術界的系統介紹，其貢獻和價值不可低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年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6冊無疑是目前整理黑水城文獻的最重要成果，它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公佈了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全部漢文文書的圖版；二是通過第6冊後附的《敘錄》對這批文書內容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整理；三是增加了《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所沒有的大量文書內容(例如從經帙拆出的文書)。《附錄·敘錄》的整理除了包括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所有整理項目並更為詳盡力求準確之外，還增加了文書的定名，尤為可貴的是增錄了大部分文書的主要內容，並對一些文書涉及的問題進行簡單考訂，對相關文書的關聯進行揭示等，為研究者利用文書作進一步深度整理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和《俄藏黑水城文獻》(包括敘錄)有關漢文文書的整理，無疑為學術界利用這些新資料提供了方便，也為推動黑水城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作出了貢獻，應該充分肯定。但是，也應該實事求是地指出，以上兩項成果也由於本身體例和客觀條件的限制，存在種種不足。例如由於受到語言和文化背景的限制，《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整理者有關文書性質判斷的失誤、文字和常識的錯誤所在多有(有些錯誤也不排除是漢譯本的原因)，特別是該書既無文書圖版又無文書錄文，研究者只能從中窺探若干文書信息，無法了解文書原貌和全貌。另外，由於時代的限制，孟列夫對漢文文獻數量的統計有誤。據孟列夫統計，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共有488件，實際上這個數位遠不是全部，尚有不少時代較早的零星寫本殘片(大部分是被用來裝裱或修補“佛經”的)未計入，也有若干件黑水城漢文遺書被弗魯格編入了敦煌文獻序列，現已收入《俄藏敦煌文獻》問世。雖然其中的一部分孟列夫已作了釐正，但也有不少是在出版《俄藏

敦煌文獻》的編輯過程中才得到了澄清。還有少數是孟列夫未及描述的，如《六十四卦圖》抄本即是其中一件。這一資料統計錯誤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得到了改正。《俄藏黑水城文獻》也存在着某些缺憾。例如，由於其文書圖版，尤其是元代寫本文書圖版字體多為行草，再加上某些雙面書寫文書中背面文字墨蹟的透墨，一般讀者閱讀起來非常困難，必須借助於專門整理者的錄文。《俄藏黑水城文獻》編者雖然通過“敘錄”將大部分文書內容作了錄文，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文書只是撮要摘錄或者未錄，並非全文逐錄。由於受體例的限制和控制篇幅的考慮，“敘錄”的錄文只能橫行排列、逐行接錄，這顯然不如直行排列、各行並列來得直觀而接近文書格式的原貌，對於讀者和研究者來說仍然頗為不便，何況其中還有不少錯誤。由此可見，以上兩項成果各有缺陷，無法滿足讀者的需要，也無法適應學術界對黑水城文獻研究的興趣日益濃厚的需要。這也是我們決心在以上兩項成果基礎上對《俄藏黑水城文獻》非佛教漢文文獻重新進行整理，力求為學術界提供一個內容全面、釋讀準確、要素齊全、格式規範的文本的原因所在。

四

本書分為整理編和研究編兩大部分。

整理編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6冊除第6冊《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之外的所有非佛教漢文文獻進行文書學的整理，^①主要是釋錄和校勘文字，包括定名、題解、錄文、標點、校記和參考文獻等。

據孟列夫統計，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共488件，前文已經指出其統計有誤。而據《俄藏黑水城文獻》編者之一的白濱先生統計，《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6冊漢文部分共收錄636個獨立編號^②文書。本書整理和收錄的非佛教漢文文獻共計189件（此處所說的件與白濱先生所謂的獨立編

^① 因《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筆者已有整理研究專著出版，故不再重複收入。參見《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版。

^② 此編號數係據白濱先生提交給“黑水城漢文文獻與宋夏金元史學術研討會”的文章《黑水城文獻整理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待刊。

號意義不同，如 ИИВ. No. 1237 號文書共有 6 個殘片 A、B、C、D、E、F，白濱先生統計為一個獨立編號 ИИВ. No. 1237 號文書，而本書整理過程中將其算作 6 件文書，以下所說件數，與此意義相同）。其中，第 1 冊收錄 5 件，第 2 冊收錄 6 件，第 3 冊收錄 4 件，第 4 冊收錄 78 件，第 5 冊收錄 23 件，第 6 冊收錄 73 件。其中可以斷定年代的文獻 182 件，其朝代構成為：唐代 1 件，宋代 15 件，西夏 72 件，偽齊 2 件，金代 10 件，元代 81 件，清代 1 件；書寫刊刻年代存疑文獻 7 件，其中宋或夏 1 件，宋或金 1 件，夏或元 5 件。^①

本書在整理過程中借鑒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規範，對文書進行了新的定名、題解、釋錄及校勘。《俄藏黑水城文獻》編者在第 6 冊《附錄·敘錄》中已對所有文書進行了定名，但是按照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規範，文書定名應包括文書撰擬時代、文書撰擬主體、文書種類和事由等內容，而《附錄·敘錄》文書定名或只包括文書撰擬主體，或只反映文書事由，定名要素不全，內容稍嫌簡略。另外，因編者對某些文書的年代斷定及文書的性質判斷方面存在錯誤，故部分定名有誤。例如第 3 冊 TK108V 號文書，《附錄·敘錄》定為元寫本，擬題為《陰鷲吉凶兆》。但是從圖版來看此件文書除下半部分殘缺，文字不可辨別外，其餘清晰可見，其內容與燒壽生錢習俗有關。且與第 5 冊 A32 號文書當中收有金代寫本《佛說壽生經》及燒壽生錢儀文內容部分相同，但非同一儀文。因此此件文書應為燒壽生錢法事之儀軌文，而非《陰鷲吉凶兆》，《附錄·敘錄》定名有誤。因此本書借鑒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規範，吸收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對所收錄文書進行了重新定名。本書的題解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6 冊《附錄·敘錄》詳細介紹的文獻紙張材質、寫刻形式、尺寸大小、存佚情況、寫刻字體、擇錄文字等，以儘量保存文獻的原始信息；二是儘量吸收目前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適當列出相關學者主要觀點，並加上筆者的判斷；三是列出參考文獻，將筆者所知已有研究成果詳細列出（已

^① 此處對文書的斷代，主要是筆者依據文書內容或參考學術界現有研究成果重新整理斷代，對於無法確切斷代的文書則存疑，故此處所列文書朝代構成與《俄藏黑水城文獻》之《附錄·敘錄》多有出入。